

清代满汉民族关系的发展与浙江辛亥革命

夏柯

(宁波大红鹰学院, 浙江 宁波 315175)

【摘要】满汉民族关系是研究辛亥革命的重要纬度之一。笔者以浙江为例,从满汉关系的角度系统梳理、分析浙江辛亥革命的背景,将之置于清初至民国近 300 年满汉关系演变的历史进程中考察,揭示其特点,深化对辛亥革命以及满汉关系史内涵和意义的理解。

【关键词】满汉; 浙江; 辛亥革命; 认同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 — 7725(2016) 05 — 0203 — 04

清代浙江满汉关系经历了一个从冲突到磨合的过程,在国家认同、地方认同、民族认同三方面形成了程度不一的格局。这一格局直接影响了浙江辛亥革命的酝酿、发生、展开与结局。它所具有的双重性在辛亥革命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辛亥革命的达成,也促使浙江满汉关系进入到新的发展时期。

一、清前期浙江满汉关系的演变及其格局

清初,浙江的满汉矛盾较为尖锐。清军南下带来了血与火的征服。战争、反清起义、剃发、迁海和旗营圈地,不仅使浙江地方陷入动荡之中,也导致满汉关系的紧张。这一状况随着国家的统一,局势的稳定,满汉间多层次的接触与交往,逐渐发生改变。自顺康年间始,经过百余年的磨合,至清代中期,浙江的满汉关系进入到稳定平衡的阶段。清政府通过标榜“满汉一体”、皇帝南巡、选任汉人官员、笼络乡绅、约束驻防旗人、摊丁入亩、赈灾及修筑海塘等政策舒缓了与浙江地方社会的关系,巩固了浙江地方统治,也增强了浙江汉族民众对清王朝的国家认同。如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下诏追谥前明忠贞之臣,其中浙籍人物为数众多。此举不仅崇奖忠贞,也有效地笼络和安抚了汉人民众。又如开科举,自顺治二年(1645)、三年(1646)首开乡试和会试后,有清一代,浙江进士人数达到近 2800 名。大批浙籍官员进入清政府,对改善浙江地方社会与清政府关系,增强浙江汉族民众对清王朝的国家认同起到了重要作用。

出任浙江地方官员的满族官僚也往往具有较高的汉文化修养,并注意与汉族官员及地方士绅加强联系,致力于地方建设,形成满汉联合统治的局面。如汉军镶黄旗人范承谟,康熙七年(1668)任浙江巡抚,“受事三载,爱民如子……浙人爱戴,深于饥渴”。其他如徐元梦、法海、觉罗雅尔哈善等满洲官员,也都具有较高的汉文化素养,在地方有所建树。这些官员出任浙江,有利于满汉间国家认同、地方认同的加强。

驻防旗营是浙江满汉关系的一个重要截面和载体。康熙朝以来,清政府对调处驻防旗人与当地汉族官民关系高度重视。随着满汉民族间经济、文化、社会交往日益密切,浙江的八旗驻防营作为一个有机部分融入到了地方社会中。康熙年间,杭州驻防满兵即出现“渐习汉俗”的倾向。乾隆年间,杭州旗人的满语已很生疏,而其所讲的汉语则是纯正的本地口音。乾隆二十一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晚清至民初江南地区满汉民族融合研究(1840 — 1928) ”(项目编号: 13YJC770057)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夏柯(1981 —), 男,浙江奉化人,副教授,主要从事明清史、民族关系史研究。

年（1756），乾隆帝改变原有归旗政策，同意驻防旗人在当地购置墓地安葬，并允准其遗属留在驻防地。嘉庆二十一年（1816），嘉庆帝允许驻防旗人在所居省份参加乡试，使得浙江驻防旗人对所居地的归属感进一步提升。他们也更多地参与到了修建海塘、防虫治灾等一系列地方事务中。满汉联姻屡见不鲜。清末杭州将军瑞兴娶了三个汉人女子。他的“左右都是汉人，他对他们全无戒心，也没有出过什么乱子”^①。旗营也不再成为禁区，很多汉人进入到旗营内当差、经商、访客、游玩、祭神。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乍浦满汉军民联手抵御英军。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杭州驻防营与乍浦水师营与当地民众共同抵御太平军攻城。这都说明浙江的满汉关系在国家认同尤其是地方认同中日渐亲密。

当然，在清政府“首崇满洲”的方针下，浙江的满汉关系不可能实现无差别化的融合。清政府一直试图保持满族的特权和独立性，在一定程度上抵制“汉化”。而在汉族社会，“反清复明”等排满思想，依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满汉矛盾并未完全消解。

总之，随着满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交流和磨合，清代浙江的满汉关系在国家认同、地方认同、民族认同三方面都得到了改善。“以和为贵，和而不同”成为清代中后期浙江满汉关系发展的基调。但这一格局存在结构性的差异。相对来说，浙江满汉双方在国家认同和地方认同上的程度较高，而民族认同次之。旗籍、民籍的身份和权利差异，驻防营的空间存在和分野，清政府对地方驻防旗人“汉化”的警惕，都使得满汉民族身份界限清晰。这一趋同而又差异化的满汉关系格局对浙江辛亥革命的过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清晚期浙江满汉关系的变化

近代以来，随着清朝统治危机的加深，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浙江的满汉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这些变化体现在两个不同的方向和维度上——“排满”风潮和“平满汉畛域”。两者都是基于清初以来形成的满汉关系格局。

在满汉双方国家认同和地方认同程度较高且关系盘根错节、错综复杂的情况下，革命党找到了磨合程度相对较低，且符号化、表面化、易操作的民族认同作为反清宣传的突破口，并把民族认同与随着清政府统治危机加剧而日渐削弱的国家认同结合起来，将满人与清政府等同起来，进而对满汉关系中的国家认同和地方认同造成冲击。

革命党以“排满”“光复”为号召，试图唤醒汉族社会的“反满”记忆，鼓动民众，达到推翻清王朝的目的。孙中山、邹容、陈天华等人的民族主义和排满思想都影响到了浙江满汉关系的变化和反清运动的兴起。而浙籍革命党人的宣传和组织则更为直接、深远。如章太炎即将满人视为夷狄，作为浙江革命党核心力量的光复会，其“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的誓词“排满”色彩浓重。革命党的这些做法扰动和冲击了既有的满汉关系格局。其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促进了革命的发展，一方面也带来了不利的因素和后患，需要辩证客观地分析和评价。

与革命党不同的是，改良派、立宪派在满汉关系问题上倡导民族融合的“大民族”观念。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梁启超即提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②清末新政期间，这一思想进一步发展。梁启超提出“合汉、合满、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③。欲达成这一目的，则必须抛弃“民族复仇主义”，这与革命党的“排满”宣传针锋相对。杨度、康有为以及部分满汉官员、士绅和留学生也有类似的言论和举动。改良派、立宪派在推进满汉关系上的吁求，促使清政府尝试进行弥平满汉畛域的改革。1908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将“平满汉珍域”作为立宪的重要内容。

清政府与改良派、立宪派将进一步改善满汉关系作为立宪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挽救统治危局，对抗和消解革命党“排满”思潮影响的重要手段。其思路与做法也是基于原有满汉关系的格局，通过强化民族认同来增强国家认同。

“平满汉畛域”对浙江满汉关系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因相关宣传未能深入民间，而具体措施推行较为缓慢，故而难以抵消革命“排满”宣传带来的影响。总体而言，“排满”思潮对满汉关系造成的冲击是辛亥革命前浙江满汉关系变化的主要方面。

尽管如此，浙江原有满汉关系的格局仍在相当大程度上保留了下来。浙江改良派、立宪派与清政府及满人仍保持了密切的关系，并在新政、谘议局、自治运动等改革运动中取得了新的一致。如浙江巡抚增韫与汉人士绅关系密切，并积极参与谘议局筹建与运行，倡导官绅合作，积极推行宪政，“官绅一致，惟浙省利益是谋”。^④学问道德冠旗营，能令“全防倾心”听命的杭州驻防协领贵林，与浙江谘议局议长陈黻宸、书记长胡钟翰、议员楼守光相善。他与立宪派领袖汤寿潜也有交谊，并支持过保路斗争。其弟子骁骑校迎升亦为陈黻宸弟子。贵林作为满族社区领袖，积极参与诸项改革活动和地方事务。1908年，他主持创办《浙江日报》，鼓吹君主立宪，并对本地事务建言献策。他还极力在满汉争端中维护国家认同，如在“秋社”组织的凤林寺集会上，发表演讲，称“我大清待汉人不薄”。^⑤

三、辛亥革命时期的浙江满汉关系

辛亥革命的爆发使得浙江的满汉关系面临一次大的调整。原有满汉关系格局的双重性和革命党“排满”影响的两面性，在辛亥革命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浙江辛亥革命得以迅速和顺利展开，避免了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和民族仇杀。这一事实表明，原有满汉磨合关系格局的基础仍然存在。从一定意义上说，浙江的辛亥革命可谓是“联满”的胜利。在此过程中，部分立宪派人士、地方士绅、满族官员和革命党人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们的理性、务实、宽容、合作的精神，促成了浙江辛亥革命顺利完成。

革命党“排满”宣传所造成的民族认同的削弱，使得武昌起义后的浙江满汉关系一度骤然紧张。在此关键时刻，满人与浙江立宪派、地方士绅的密切关系起到了安定局势，避免事态激化升级的作用。浙江谘议局议长陈与协领贵林密约：“设公能从民军，我当与汤蜚先谋，以杭州为天下，移各省，令满汉不复相仇，救中国之民，则公之功不徒在浙江也。”^⑥胡钟翰、楼守光等人也极力劝说贵林。陈还通过贵林之母戒其勿战。此举收到了良好效果。当关于南京满汉激战的传言在杭州旗人间引起骚动，倡言报复之际，贵林与其弟子骁骑校迎升力戒旗营军士暴动。贵林又召所属，其：“尔知文明国之战斗公例乎？非战斗者，在保护之例。与居民相亲爱数十年，忍一旦仇之乎？”^⑦

随着革命风潮的迫近，浙江士绅与立宪派人士试图劝说浙江巡抚增韫宣布独立。11月3日夜，谘议局副议长沈均儒拜访浙江巡抚增韫，请将营墙先行拆卸，满人编入汉籍，宣告独立。可见浙江士绅和立宪派主张顺应时势，避免满汉冲突升级。增韫心存侥幸，犹豫不决，导致机会错失。

11月4日午夜，新军入城，攻打巡抚衙门。增韫被俘。此时，在旗营内的贵林，劝说将军德济及各军官放弃派兵增援巡抚衙门及炮轰城内的计划，给旗营与新军谈判创造了条件。新军也没有贸然进攻旗营，而是通过增韫，两次写信劝降，但将军德济及属下仍闭城自守。15日凌晨至午时，新军包围旗营，在城隍山架炮轰将军衙门，为避免误伤，不使炮弹开花。旗营欲还击，为迎升所止。此时，陈、贵林等人再度发挥作用。陈、胡钟翰在数日前已开始劝说与革命党关系密切的谘议局副议长陈时夏、议员褚辅成等以和平方式解决旗营问题。至此，陈又与陈时夏、褚辅成、沈均儒等谋划，请新军领袖周承葵同至谘议局商谈。诸议员与绅士在座者一百余人。周承葵也偏向和议。午后，陈即以电话告旗营议和，随即派人赴旗营，约请代表往商。将军德济派贵林、穆克德春赴会，要求革命军以人道精神，维持和平。下午16时左右，在浙江满汉官民中享有极高威望的立宪派领袖汤寿潜及时从上海赶到。经一番争执磋商，贵林和汤寿潜在简约上画押。贵林持约返回旗营，劝说将军德济接受和议，并解散军士，交出武器。晚7时左右，杭州旗营和平归降。汤寿潜以浙督名义贴出告示：“旗营已缴枪械，军府担任保护，宣布共和主义，决无自背人道”，“所有驻防旗人一律编入民籍，此后共乐升平。”^⑧

总体而言，杭州革命的主调是和平、合作、宽容和理性的。满汉双方虽一度剑拔弩张，终于化干戈为玉帛。双方的损失都有限，满汉合计死亡约10人。杭州革命的顺利成功促使革命风潮席卷全省，十一府纷纷宣布易帜。乍浦旗营问题也顺利解决。辛亥革命在浙江取得了全面胜利。四、结语清代浙江的满汉关系经历了一个从冲突到磨合的过程，在自然演进和人为调控下，国家认同、地方认同、民族认同三方面形成了程度不一的“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格局。这一具有一致趋向性和结构差异性特征的满汉关系格局对浙江辛亥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浙江辛亥革命将这一双重性进行了诠释和演绎，充分体现了清代浙江满汉关系发展的基调和结构性矛盾。辛亥革命也彻底改变了清政府主导下的满汉关系格局。在“咸与维新”“五族共和”的思想指

导下，在“旗人入民籍”等政策的推动下，浙江满汉关系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在打破了清政府刻意设置的隔阂、藩篱，淡化了清末“排满”的负面影响后，浙江满汉民族的磨合和认同程度得到了提升，逐步具有了现代意义的国家认同、地域认同、中华民族认同的特点。

参考文献：

- ①张廷栋. 杭州旗营与八旗子弟 [A]. 浙江文史集粹·社会民情卷 [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31.
- ②梁启超. 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 [A]. 梁启超全集（第1册）[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52 — 54.
- ③梁启超. 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 [A]. 梁启超全集（第2册）[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1069.
- ④增韞. 巡抚增韞奏谘议局会议始末情形 [A]. 辛亥革命浙江史料续辑 [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117 — 118.
- ⑤徐双韵. 记秋瑾 [A].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M].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1. 220.
- ⑥⑦迎升. 辛亥杭州驻防失守记 [A]. 辛亥革命浙江史料续辑 [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412. 413.
- ⑧浙军都督告示 [A]. 辛亥革命浙江史料续辑 [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406.